

香港應如何做好五年規劃(上)



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十五五」規劃綱要，行政長官李家超隨即發文，指各政策局早前按他指示成立的預備小組現已轉為「香港五年規劃編制小組」，會全速編制香港五年規劃，並在今年內完成有關工作。特區政府今次編制香港五年規劃，已委任專責官員主理，將全政府動員，並諮詢立法會、舉辦大型論壇及諮詢公眾，帶領社會各界參與。筆者數十年來關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擔任過全國人大代表及廣東省人大代表，長期從事為內地官員在經濟政策提供培訓的工作，在此分享對香港如何做好五年規劃的淺見。

劉佩瓊

香港一向奉行自由經濟政策，依賴市場調節機制。回歸後尤其是近年，特區政府的治理思維因應時代所需而作出明顯轉變，在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方面不遺餘力，然而要編制一份周全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始終是重大的範式轉變，這對特區政府及至整個社會，都是一項重大挑戰。

內地改革將市場經濟注入計劃經濟

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1993年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副」，之後更致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種將市場機制（如供需、價格）與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結合的混合經濟模式，將市場經濟規律注入原來的計劃經濟中，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運用政府的宏觀調控克服市場弊端，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

編制香港五年規劃，目的是要推動香港主動

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與國家發展相向而行，為國家高質量發展貢獻香港力量，同時實現香港自身更好發展。

筆者以往為內地官員進行培訓，主要講授關於香港經濟的發展概況和特徵，闡釋市場經濟的主要性質，例如公平競爭、信用與法治配合的重要性、資訊公開，還有企業的自由運作及市場退出機制等，在課程中引入公營部門經濟學理論，即在市場經濟制度下政府的職能，引申到國家在改革過程要審視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例如，政府干預經濟，主要矯正「市場失靈」的問題。其中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供應公共產品，例如國防、基礎教育、衛生醫療、無線電波、互聯網、郊野公園等。

第二，提供半公共產品，例如高等教育、住房、公共康樂設施等。

第三，產權不易清晰界定，私人及社會成本出現差異，例如公海資源保護及自然環境保護、城市規劃等。

第四，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大而回報期長，還涉及跨區合作，例如三峽工程、高鐵、高速公路、鋪設光纖等。

第五，提供社會保障，包括「一老一幼」保障、社會福利等。

公共產品的供給又有不同層次，包括私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及國際性共同負擔的。例如地方政府負責當地市政服務、治安及消防。全國的交通、通訊網

絡、河域管理則需要由中央政府統籌。

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首先把政府的產業下放到市場，集中力量加強公共產品供應。例如，2006年修改《義務教育法》，確立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負責九年基礎教育的經費；為了保護自然環境，逐步設立流域管理的「河長制」、「湖長制」及「林長制」等；上世紀末開始在全國鋪設光纖。

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範圍

中央政府不但為人民提供公共產品，並且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把公共產品的範圍擴大，以利改善民生，適應新時代科技創新，推進高質量發展。國家「十五五」規劃就包含很多方面，提出要完善現代化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基本建成全國統一電力市場體系，完善油氣「全國一張網」運行調度機制；加快建設現代化水網；完善信息通信網絡，深化第五代移動通信（5G）、千兆光網規模部署，推進第五代移動通信演進（5G-A）、萬兆光網建設發展和第六代移動通信（6G）技術創新，推動移動物聯網自主迭代。深入推進東數西算工程，構建多層次算力設施體系和全國一體化算力網。實施國家區域鏈網絡建設工程。完善民用空間基礎設施，統籌建設衛星通信、導航、遙感系統，加快低軌衛星互聯網組網。推進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礎設施數智化升級。

香港制訂五年規劃的思路

在國際性公共產品方面，國家積極參與國際性組織，執行其規則及決議。在當今地緣政治秩序混亂的大環境下，更需要穩定可靠的國際

性公共產品。國家近年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提出並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及全球治理倡議等，為不確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確定性。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要編制五年規劃，其思路應結合市場和政府的力量，即在市場經濟的框架注入規劃的供應。當中涉及兩個方面：首先要界定公共產品的範圍，容許在私營為主的範疇加入政府的決策導向及供應；第二要作出政府機構改組調整，目的是讓規劃有持續性及執行力。

在第一個問題上，特區政府急切要做的，是按照國家「十五五」規劃內要提供的公共產品，審視香港的現況。香港很多長期以來由私營部門供應的產品和服務，是否要重新界定為公共產品或半公共產品？例如土地規劃及使用，新基建「六張網」的建設等。香港有些產業在過去很多都由私營公司供應，甚至壟斷，例如公共交通、電力供應、通信網等等。這些是否要考慮引入競爭機制，適應新科技、新產業的發展需要呢？可否進行改革以適應社會所需，特別是能否與大灣區的發展對接？

當然，編制香港五年規劃決不是由自由市場經濟轉為計劃經濟。國家「十五五」規劃強調，推進適應全國統一大市場要求的產權保護、市場准入、信息披露、社會信用、兼併重組、市場退出等制度建設。依法平等長久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制定重點領域商業秘密保護規則指引。完善市場准入制度，動態修訂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嚴格落實「全國一張清單」管理要求。完善企業質量、安全、環境等信息披露制度規則。強化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功能，深入推進信用信息歸集共享和信用應用拓展，完善守信激勵、失信懲戒和信用修復機制。健全企業破產制度，探索建立覆蓋所有經營主體的簡易退出機制。

特區政府需要完善有利於統一大市場建設的統計、財稅、考核制度，推廣經營主體活動發生地統計，優化企業總部和分支機構、生產地和消費地利益分享。

香港編制五年規劃也要堅持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相結合。（未完，明日續）



●編制香港五年規劃，目的是要推動香港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同時實現香港自身更好發展。圖為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持編制香港五年規劃的籌備會議。資料圖片

北都發展謀劃長遠 在變局中彰顯確定性

劉智元 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



日前，新加坡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率團訪問香港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實地了解園區規劃、科研設施及產業布局。這次訪問不僅體現新加坡對北部都會區發展的高度關注，也釋放出一個清晰信號：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之際，愈來愈多經濟體正重新審視北部都會區在連接內地與國際創新體系中的戰略價值。

在不確定性成為全球經濟常態的背景下，如何為產業和資本提供長期發展的「確定性」，正成為各地政府與企業共同面對的核心課題。香港近年來的一系列部署，正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而北部都會區，則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長期布局。

對接全球市場 吸引長期資本

長期以來，香港以成熟的資本市場、高度專業化的服務體系，以及連接中國內地與全球經濟的獨特角色見稱。這些優勢一如以往，而香港正在此基礎上主動求變，加快拓展先進製造、生命科學及科技導向產業，推動經濟結構的進一步升級。

這一轉向並非偶然。一方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高端製造和科技創新正成為全球競爭焦點；另一方面，越來越多具科研與製造實力的內地企業積極「走出去」，希望在國際化過程中，既能對接全球市場，又不脫離本地研發和供應鏈體系。北部都會區正是在這兩股結構性趨勢下應運而生。

與短期項目不同，北部都會區體現的是一種長期、系統性的規劃思維。

它並非單一產業園或城市開發，而是通過持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空間布局優化及制度配套，打造一個能夠跨越經濟周期的增長引擎。在當前全球供應鏈重組、地緣環境複雜多變的情況下，這種清晰、可預期的發展路徑，正成為吸引長期資本的重要因素。

從城市功能的角度看，北部都會區也折射出香港更為清晰的定位分工——維港沿岸及南區將繼續作為金融和專業服務核心，承擔資本配置、制度支撐和國際對接的角色；而北部都會區則為科

研、技術轉化、先進製造及現代物流提供必要空間，彌補全球城市普遍面臨的「產業承載不足」問題。這種「南金融、北科創」的互補式布局，有助於形成更具韌性的「雙引擎」結構。

制度優勢是北部都會區另一項關鍵吸引力。香港長期實行普通法制度，嚴格保護知識產權，並與國際規則高度接軌，為跨區域、跨市場合作提供了高度可預期的環境。在科技創新和高端製造領域，制度穩定性往往比短期成本更具決定性意義。這種制度優勢，也正在轉化為現實的協作能力。通過科研平台、創新園區及跨境合作機制，香港逐步形成一個讓內地與國際創新主體「共研、共創、共享市場」的開放環境。大灣區近年來在全球創新版圖中的地位不斷上升，正是這種協同效應的體現。

人才與產業的結合，是這一模式能否持續的關鍵。規劃中的北都大學城，正是為打通「產學研」而設。通過將高等院校、研發機構、創新平台與產業空間進行更緊密的硬件和功能整合，科研成果更有條件加快走向產業化，企業也更容易獲得穩定的人才和技術來源。

推動高附加值製造業發展

在先進製造領域，這種模式已初見成效。相比單純追求規模擴張，北部都會區更強調在清晰監管和國際標準框架下，推動高附加值製造業的發展，再通過大灣區實現規模化落地。這種「香港研發+大灣區製造」的協同路徑，正在為微電子、生物醫藥等行業提供現實選擇。

此外，北部都會區在物流與連通性方面的優勢，也進一步強化了其產業吸引力。高效連接內地供應鏈與國際市場，使科研成果、樣品及成品能夠在不同環節之間快速流轉，這對時效和質量要求極高的產業尤為關鍵。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北部都會區的意義，並不在於短期能帶來多少項目或資金，而在於其所代表的一種發展邏輯：在高度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中，通過長期規劃、制度優勢與區域協同，為產業和資本提供穩定的可預期性。對於願意放眼長遠的企業和投資者而言，這不僅是一項發展機遇，更是參與塑造區域創新與產業協作新格局的重要平台。



連根拔起

美國唯我獨尊眾叛親離

文平理

2025年6月，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發動「午夜之錘」軍事打擊；2026年2月28日，又聯合以色列發起「史詩狂怒」行動。一系列行動都打着「防止核擴散」的旗號，卻完全繞過聯合國安理會和美國國會，擅自將地區局勢推向更危險的邊緣。美國始終以自身利益為中心，對全球規則予取予求，玩弄「合則用、不合則棄」的霸權老把戲，失道寡助終自食惡果。

美國向來擅長給軍事干預和經濟打壓披上一層「高大上」的外衣，打着維護民主自由、反恐的旗號，聽着冠冕堂皇，實際目標卻始終圍繞資源、地緣控制和經濟利益。過去相當長時間，美國利用戰後建立的道德權威、實力優勢、意識形態，多次牽頭組建「聯合國軍」，對別國進行武力干涉。

難掩掠奪資源好戰本質

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直接或間接參與、主導的戰爭數不勝數，例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敘利亞戰爭等，幾乎每一場都以「正義」之名開戰。這種情況變本加厲，美國的霸權行為日益令全球反感。

2003年，美國以虛假「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為由入侵伊拉克，連德法等核心盟友都公開反對；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收取全球「鑄幣稅」，並通過單邊制裁脅迫他國；在拉美推行「新門羅主義」，通過政治干預、軍事介入和政權顛覆，把地區資源牢牢緊握在手裏。

近年來，美國毫不掩飾擴張主義野心，特朗普政府多次公開表達對格陵蘭島的領土企圖，甚至揚言不惜動用武力「吞併」該島。特朗普曾聲稱「我們絕對需要格陵蘭島」，在被質疑此舉是否會損害美國與北約歐洲盟友關係時，他直言「如果影響北約，那就影響吧」「北約更需要美國」。為脅迫歐洲盟友在格陵蘭島問題上讓步，特朗普對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和芬蘭等國進行關稅施壓。與此同時，特朗普還多次提出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的構想，公然威脅盟友主權安全。

在本國經濟面臨挑戰之際，特朗普政府發動全球性關稅

戰，引發各國強烈反彈和報復性反制措施。其單邊發動的全面關稅戰被美國聯邦法院判定違憲，而對伊朗民用基礎設施的打擊則被超過100位國際法專家聯名指出嚴重違背國際人道主義法，可能構成戰爭罪。從強行劫持委內瑞拉總統到威脅軍事干預他國內政，特朗普政府的行徑表明美國「一視同仁」地無視國際法和國際法，在國際關係和外交事務中愈發唯我獨尊、為所欲為。

全球掀起「去美國化」熱潮

全球「去美國化」的腳步愈來愈快。歐洲戰略自主呼聲高漲，亞太地區的盟友開始對沖風險；全球南方更是明顯疏離，印度、巴西、南非等新興大國中，願意加入美國主導集團的比例在過去兩年裏大幅下跌。

此次中東戰事爆發後，北約盟友紛紛與美國劃清界限，明確表示「這不是我們的戰爭」。德國總理默茨直言中東戰事令德國經濟「很受傷」，並指責美國導致局勢「急劇升級」，法國總統馬克龍警告特朗普質疑北約的言論「侵蝕了聯盟的根基」，而英國首相斯塔默則堅持「這不是我們的戰爭，我們不會被捲入其中」。面對美國提出的霍爾木茲海峽護航要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等北約國家要麼明確拒絕，要麼含糊其詞。西班牙政府甚至決定對參與對伊朗軍事行動的飛機關閉領空，意大利拒絕美軍戰機在該國降落加油，法國也對與戰爭相關的美軍飛行活動關閉領空。民調顯示，整個歐洲僅有約16%民眾仍視美國為可靠盟友。

美國今天眾叛親離的困境並不令人意外，根本在於其霸權思維和行徑已無法適應多極化世界。美國曾經自我標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世界領導者，如今已徹底撕下偽裝，回歸叢林法則，公然侵略他國、掠奪資源；當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淪為只服務一己私利的「幫規」，盟友自然會選擇離場。

今年的中東戰事，全球主流聲音一致譴責美國，美國傳統盟友大多拒絕提供支持，這是美國失道寡助、霸權衰落的必然結果，更是美國國際領導力徹底破產的最佳證明。